

全球化與兩岸英語人才開發策略 的比較分析

王 瑞 琦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四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 要

二十世紀末，為因應國際化、全球化的潮流，兩岸均全力推動英語人才的培育。關於英語人才的培育，兩岸研究者主要從英文教學的角度分析。但是，從人力資源發展策略的角度觀之，政府政策、民間學習的資源、人力資源的儲備均是觀察之要素。本論文研究顯示，就二十一世紀兩岸英語人才發展而言，儘管台灣在英語教育的發展和科技資訊方面仍占優勢，但在政策的推動上遠不及彼岸的積極與效率。台灣的人力資源儲備更是處於劣勢。台灣要保持現有的優勢，不僅要提高民眾的英語水平，更應致力提昇專業人才的英語能力。

關鍵詞：全球化、人力資本、英語教育、英語人才培育

* * *

一、前 言

二十世紀末，大陸經濟發展快速，大陸的人力素質也因高等教育的擴張而不斷的提升。北京、上海逐漸發展成為以白領階級為主的城市。本土新秀擠入了原來由港、台和歐美人才所組合的管理階層，近年已出現取而代之的趨勢。工資低廉，在人數上動輒以萬、十萬為基數的專業人才也成為大陸吸引外資和台資的利器。近年來，台海兩岸人才的相互競爭，似乎已從彼岸的經理人才本土化、兩岸跨文化和國際型人才的培育，延伸至美國矽谷^①，兩岸人才競爭的戰場如藍麗娟所言，不在大陸，更不在台

註① 關於兩岸人才發展現況的報導，請參閱 CHEERS 編，**搶不走的優勢：兩岸人才大車拼**（台北：天下雜誌，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林靜宜，「台灣科技人才爭鋒矽谷」，**遠見雜誌**，民國九十年五月一日，頁一五五～一六〇。

灣，而是在全世界^②。

二十世紀末，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將世界各國聯繫在一起，英語成爲與外面世界相通不可或缺的語言工具。爲了在全球化的潮流中爭取優勢，不被淘汰，各國莫不致力於提升人力資源的素質，推動遠距教學、大學教育國際化，和英語教育的發展。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台海兩岸也先後開始倡導知識經濟，及強調高科技人力的培育。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兩岸分別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下簡稱「入世」）之後，爲因應國際化、全球化的潮流，對於培育具有國際觀的專業人才均寄予高度的重視。一個國際型專業人才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中、英語文能力俱佳。近年來，在論及兩岸人才的競爭，台灣學界和企業界對於專業人才英語能力的偏低憂心。因此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在全球化以及與大陸之間不可避免的競爭之中，台灣英語人才的開發具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大陸學者陸杰華指出，人才資源是人力資源中最優秀的一部分，其所形成的時間較長、培育的費用較大、專業特定性也較強^③。就人力資本投資而言，專業、專才的培育課題包括教育、在職訓練、健康、經驗等^④。關於英語人才的培育，台灣的學者絕大部份是從英文教育的角度分析，諸如教學、師資的改善、網路資源的利用等，對於兩岸英語人才的培育分析也側重在教學、課程方面，並以報導性質居多^⑤。然而，人才資源的開發有賴於人力資本投資，僅是比較分析英文教育本身的發展，實難讓吾人正確地掌握二十一世紀兩岸雙語人才競爭的形勢，而今台灣教育和科技資訊的發達的確也常導致過度樂觀的評估。

人力資本投資有兩個主要管道：一是供應各種資格（*qualifications*）和知識的正式教育；一是透過訓練讓工作者獲得技術（*skills*）、能力（*competence*）和專業（*expertise*）^⑥。本論文以全球化和英語語文擴張爲起點，根據過去半世紀台海兩岸人才資源與英語人才發展策略的變化、英語教育的發展，以及民間培育的資源的比較分析指出，過去十多年，由於政爭和去中國化情結等因素的影響，台灣的整體人才發展策略不明，英語教育發展策略偏重在人民基礎英文素質的提昇，高級英語人才發展不僅

註② 藍麗娟，「兩岸人才競爭力比較」，CHEERS 編，前引書，頁四四。

註③ 陸杰華，*人力資開發與緩解貧困*（北京：新華書店，一九九九年），頁一〇。

註④ Theodore W. Schultz, *Restoring Economic Equilibrium: Human Capital in the Modernizing Econom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0), p. 87.

註⑤ 如徐薇，就口音、教學方式、教學系統、學習動機等方面進行比較，但是仍屬報導性質。另葉俊士專題研究大陸大學英文課程和大學學生英語能力鑑定考試制度，並由之比較近年台灣大學英文教育的發展，見李俊明、臧聲遠，「搶救台灣學生英語程度：兩岸英語能力比一比」，*Career 就業情報*，第三二期（二〇〇二年），頁八〇；葉俊士，*大陸高校英語教育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一年七月。

註⑥ Richard Blundell et al.,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he Returns from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the Individual, the Firm and the Economy," *Fiscal Studies*, vol. 20, no.1 (March 1999), pp. 1~23; Vijay K Mathur, "Human Capital-based Strategy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vol. 13, no. 3 (August 1999), pp. 203~216.

停滯，近年更面對著國際型人才資源萎縮的危機。相對的，文革結束之後，大陸擺脫反美情結，在國家的強勢介入之下，進行英文教育考試制度的建立，近幾年又展開英文教學改革，同時致力挖掘雄厚的留學生資源。因此，儘管台灣在教學和資訊的獲取上均優於對岸，但是從人才資源儲備和未來發展的角度觀之，台灣正面對優勢漸失的挑戰。台灣想要保有現今仍存的優勢，在整體人才策略方面，應速從意識形態的爭論之中跳脫出來，為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關係中找尋出適當的定位，在英語人才發展方面，不僅要提高民衆的英語水平，更應致力提昇專業人才的英語能力。

本論文主要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第二段）從全球化、英語霸權，和專業知識的普及化，為兩岸英語人才的發展定位；第二部分從兩岸人力資源發展策略的變遷（第三段），和英語教育的發展（第四段）、訓練（第五段）兩個投資要素比較分析兩岸英語人才的培育。訓練包括在職訓練、各類民間英語學習資源，由於本論文著重人才的儲備，因此以後者為著重，並以「民間英語人才培育資源」為題；第三部分，也就是第六段，將比較分析「入世」之後兩岸對於培育英語人才採取的策略；最後在結語中，筆者就本論文分析之所得對台灣的英語教育的發展提出己見。

二、全球化、英語霸權、專業人才

一九九〇年代，世界從後現代主義走入了全球化的時代。科技的發展縮短了世界各國之間的距離，在多方面出現趨同性的發展。在經濟方面，看到的是每日一兆美元以上交易量的全球電子金融市場。一九六〇年代，美國跨國公司獨霸全球；一九九七年，世界前五百名跨國公司中，日本占 25.2%，緊追在美國 32.4% 之後；英、法、德分占 6.8%、8.4% 和 8.2%^⑦。在政治方面，國際組織蓬勃發展，從政府之間的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東南亞國協、歐盟等），到非政府組織（如綠色和平組織、國際特赦組織等），以至超國家組織（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的成立，國家權力與權威相對衰退^⑧。科技知識的流動促進了國際市場中科技創新比例的提升、研發的擴張和全球科技的合作^⑨。資訊科技的發達加速了學術人才的流動，拉近不同國家人民之間的距離，形成「國際村」，文化也進入了跨國化的過程，形成了所謂的全球化，卻也引發了本土化與國際化，東、西方價值觀，以及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民族之間的衝

註⑦ Charles W. L. Hill, *Global Business Today* (New York: McGraw-Hill, 2001), pp. 20~21.

註⑧ Sandra Taylor et al., *Educational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57~58; Val D Rust, "Toward Taiwanese Educational Polic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digenization," *教育科學的國際與本土化* (台北: 揚智出版社, 民國八十八年), 頁二九~五三。

註⑨ Salley Davenport, David Bibby, "Rethinking a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Small Country as 'SME,'"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vol. 11, no. 3 (1999), pp. 431~462.

突^⑩。如何協調本土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成爲許多政府的一大挑戰。

在全球化潮流中，各國政府面對的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就是開發人才以提昇國家競爭力。就人力資源發展而言，全球化的發展有兩個重要特質：一個是英語霸權，另一個是專業知識的普及化。

(一) 英語霸權

David Crystal 指出，英語能成爲國際語言之一，並不在於英文本身的特質或學習簡易，乃在於使用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強權。正如希臘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因亞歷山大、羅馬、回教的興起，曾經盛極一時，英文先後仰賴日不落英帝國和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強權，成爲國際共用語言（*lingua franca*）之一，並在二十世紀後半期，因美國高科技的發展和大眾傳播媒介的更新，從電報、電話、收音機、電視機以至網路的發展，不斷擴張，以致有英語霸權（*hegemony of English*）的現象^⑪。

一九八〇年代初，Braj Kachru 以內、中、外三個圓圈，爲英文在世界各國的使用進行分類：(1) 最內圈，是以英文爲主要語言的美國、英國、愛爾蘭、加拿大、紐西蘭；(2) 中間層屬於外部延伸，包括新加坡、印度等 50 個具有多種語言（*multilingual*）背景，以英文爲第二官方語的國家或地區；(3) 最外層是擴張範圍，包括中國、日本、希臘等，視英文爲國際語言，將之列入學校教育課程的國家^⑫。David Crystal 認爲，前二類國家的英文均享有特殊地位（*special status*），屬於官方語言和人民生活用語之一種，可合而爲一類，而這類國家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已達 70 個^⑬。Alexander Macleod 並指出，由於美國的人口數量遠超過英國、美國的強權和科技優勢，世界上 70 % 以英語爲母語者（約 3.5 億人）使用美式英文，即便是英國人現在也接受“*campus*”，“*guy*”等詞句，並以“*movie*”取代“*film*”^⑭。

語言政策和政治本來就是不可分的，在擴張的過程中，英語教育一直就難擺脫國家、文化認同爭議的陰影^⑮。早在一九六〇、一九七〇年代，前英國殖民地國家如肯亞、坦桑尼亞，以及馬來西亞就先後廢除英語爲第二語言。一九九二年當塞浦路斯政府將英文定爲第二官方語，並要求新成立的塞浦路斯大學使用英文授課之後，反對黨

註^⑩ 高博銓，「全球化與教育改革」，*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第十二卷第六期，二〇〇二年四月，頁一〇～一二；Cao Xiaonan, “Debating ‘Brain Drai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Compare*, vol. 26, no. 3, pp. 267~285.

註^⑪ David Crystal,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7~8; Cynthia L. Kemper, “Scare Bleu! English as a Global Lingua Franca?” *Communication World*, vol. 16, no. 6 (June/July 1999), p. 41.

註^⑫ Braj Kachru,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Oxford: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2).

註^⑬ David Crystal, 前引書，頁五三～五五。

註^⑭ Alexander Macleod, “The World Rushes to Speak and Write ‘American’ English,”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4, 1996, p. 10.

註^⑮ Crystal 認爲，英文教育的擴張所引起的國家、文化認同的疑慮，常見於前述最外層，也就是以英文爲第一外語的國家，見 David Crystal, 前引書，頁一一三～一一六。

即以國家、文化認同為訴求，強烈抨擊^⑥。美國的雙語教育政策很早就跳出教育或語言政策的範圍，其發展明顯地反映了不同時期社會團體之間的權力關係，尤其是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更引發激烈的意識形態之爭^⑦。近幾年，英語霸權的現象也在瑞士、法國等歐洲國家，掀起了對本土語文和文化發展的關懷^⑧。

(二) 專業知識的普及化

美國知名教育學者，一九六〇年代初加州大學教育發展模式的舵手 **Clark Kerr** 認為，知識經濟的特色之一是「知識普及化和專業知識普及化」^⑨。舒茲 (**Theodore W. Schultz**) 將知識分成兩類：「專業知識」和「一般知識」(**common knowledge**)。專業知識主要指的是那些有助於物質資本 (**physical capital**，如電腦、電訊器材) 品質提昇的知識；至於一般知識，因國家而異，而且差異甚大，難以掌握。經濟現代化的要素之一即在於把握住專業人力資本 (**specialized human capital**) 的累積^⑩。波特 (**Michael E. Porter**) 也將影響國家競爭優勢的生產因素分為高級和初級兩類。就人力資源而言，初級因素是非技術勞工與半技術勞工；高級因素為高等教育人力 (如電腦科學家和工程師) 以及各大學研究所。他指出，真正重要的競爭優勢須藉由高級、專業型、具有創造和提升動力的生產因素才能達成^⑪。一個國家的經濟要升級，人力資源的品質就必須持續提升，並且達到其他國家所設定的人力水準，以維持現有的競爭地位。因此，就一九九〇年代初的世界經濟發展而言，擁有識字能力的勞動力已不再像以前被視為一項競爭優勢^⑫。

簡而言之，處於全球化、英語霸權，以及專業知識普及化的浪潮當中，一個國家想要提昇競爭優勢，顯然不僅需要提升人民的基礎英文能力，更要培育具有國際視野的中、英語文能力具佳的專業人才。因此，一向強烈排斥英文的德、法等歐洲國家，先後將英文列為第一外國語文，歐洲重量級的大學亦紛紛推動英語授課，英語成為這

註⑥ Andreas N. Papapavlou, "Linguistic Imperialism? The Status of English in Cyprus," *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vol. 25, no. 2 (2001), pp. 167~176.

註⑦ 比如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美國社會和政策對於英語以外的語言多寬容對之，但是一九八〇年代之後獨尊英文 (**English-only**) 的傾向逐漸明顯。過去 10 年，官方語言政策、移民、雙語教育，以及學校在社會中的角色等在美國社會中均會引起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論。請參閱 Rebecca D. Freeman,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8), pp. 39~57.

註⑧ "In Europe, Some Fear National Languages Are Endangered,"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2001, A. 1.

註⑨ Clark Kerr,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Issu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4), pp. 12~14.

註⑩ Theodore W. Schultz, 前引書，頁一七六。

註⑪ 李明軒、邱如美譯，波特著，**國家競爭優勢 (上)** (台北：天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六年)，頁一一四~一一五。

註⑫ 李明軒、邱如美譯，波特著，**國家競爭優勢 (下)**，頁九〇六~九〇七。

些國家人民爭取加薪、轉換高職位的必備條件之一²³。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泰國等小學均先後開設課程²⁴；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初，香港為鼓勵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參加統一英語水平評核（**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IELTS**），宣佈將發還同意畢業成績單內註明曾參加英語評核者的測試費用²⁵。韓國一些大學以就業保證鼓勵學生參加英語能力和電腦證照考試；日本研究型大學的研究所也開始以英文授課²⁶。

近幾年來，為了國家競爭力的提昇，台海兩岸也同步推動英語教育的發展，但因政治環境背景的變遷和人力資源發展政策的調整，採取了不同的策略。

三、兩岸英語人力資源發展策略的轉變

一九八〇年代初兩岸的政治環境先後出現轉折性的發展，大陸從反美、鎖國進入到經濟改革開放，台灣則從威權政治進入民主化過程。大環境的改變直接影響到兩岸的人力資源發展策略和英語人才資源的發展，以下即以一九八〇年為界分成兩階段分析之。

（一）第一階段（一九四九年～一九八〇年）：

大陸英語人力的急速萎縮 vs 台灣的蓬勃發展

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之後，大陸進入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從原來公、私並存的體制，轉化為單一的公有體制。最初，中共採取學習蘇聯經驗，發展教育，培育人才，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就轉入了土法鍊鋼的鎖國時期，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之後，當人力資本的理念在歐美開始大行其道時，大陸卻在文化大革命的環境中煎熬。在三十多年動盪不安當中，大陸的大學先是建立了重點與普通大學的體制，後在大躍進時期，隨著「兩條腳走路」的發展策略，分為正規和非正規兩類²⁷。其所培育的人才都是國家的財產，沒有選擇工作的權利，畢業後由政府分配至各企事業單位，或實踐為「無產階級」和「群眾路線」服務的口號，上山下鄉。大鍋飯制度和中共的「無失業」政策使得勞動力市場靜如一潭死水²⁸。

這段時期，受到中共親蘇，獨尊俄文政策的影響，英文教育飽受壓抑，並在大專

註²³ 如瑞士、法國將英語列為第一外國語，在德國，英語授課成為推動大學教育國際化的主要措施。*Ibid.*, I Seaton, 前引文；Barbara Wallraff, 前引文。

註²⁴ 李振清「英語教育三十年」，*海外學人*，二〇〇一年四月，頁二四～三一。

註²⁵ <http://www.ugc.edu.hk/chinese/documents/press/pr011102c.html>

註²⁶ 根據韓國在台留學生、名古屋大學大國際開發研究科教授大塚豐二〇〇二年十月十八日來台訪談。

註²⁷ 王瑞琦，*中國大陸大學聯招與高教之發展*（台北：文笙書局，民國八十三年），頁四二、四九。

註²⁸ 關於經濟改革政策實施前大陸的人力發展政策，請參閱高長，*中國大陸人才資源分配問題之研究—從制度面分析*（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民國七十一年九月）；王瑞琦，「論『文革』後大陸人才資源配置」，*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一卷第六期，民國八十七年六月，頁八一～一〇〇；廖元和，*中國西部工業化進程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九月），頁八六～九〇。

院校調整、合併的過程中急速萎縮，許多地方中、小學因而取消英文課程。直到一九五六年，俄文人才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大陸的英文教育發展才出現轉機，並在一九六四年的「外語教育七年規劃綱要」中被列為第一外語，但是旋即因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而告停擺。一九七一年大陸進入聯合國，次年二月前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外語人才，尤其是英語人才的培育重現生機。然而，由於當時師資、教材極度缺乏，又受制於大鍋飯制度和平均主義的環境，缺乏激勵措施，大陸英語教育的發展可以說是舉步維艱²⁹。

台灣和大陸一樣，也在威權體制之下，也強調意識形態的純正，但是更重視經濟的發展，自一九五三年起，就開始實施四年一期的經濟建設計劃。一九六六年農業社會開始轉型為初級工業社會後，台灣採納美國史丹佛大學學者和聯合國專家的建議，以第四期經建計畫為基礎提出了第一期的人力發展計畫，並按之規劃各級教育的發展，形成經濟建設、人力發展規劃與教育發展三合一的政策³⁰。三合一的政策偏重職業教育的發展，以五年制專科學校（簡稱五專）為主，以應當時勞力密集型產業發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因留學熱潮，高層次人才大量流失³¹，碩、博士生教育的發展也受到重視。不過由於五專泰半為私立學校，缺乏國家財政的補助和扶持，資源相當匱乏，主要仰賴學費的收取，因此以利潤為導向，質量甚差，受到強烈的抨擊，終於導致一九七二年立法院通過私立學校新校禁建，大學招生人數成長比例也壓縮在 3 % 左右，長達十年³²。

台灣的經濟在這段時期發展快速，英語備受重視，在中學階段，與國文、數學並列為主要科目，在大學是一年級共同必修科目之一，與國文同為 8 個學分。雖然各級學校的師資不足，教學純以灌輸式和填鴨式進行，但是激烈的升學競爭、留學熱潮（如公費留學考試、托福考試）、薪資優厚的外商和航空公司等的招聘，以至部份公務人員高考對英文能力的要求，均構成青年學子勤學英文的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也成為各類英文補習教育和廣播教學發展的主要動力。一九七〇年代後期，因美國的不景氣，滯流在外的留學生開始回流³³，成為台灣一九八〇年代的民主化、人力資源、教育，乃至科技發展的主要動力。

註²⁹ 請參閱葉俊士，**大陸高校英語教育之研究**，前引書，頁三九～五二。

註³⁰ 請參閱鑽天錫、全煥模、張丕顯，**人力政策的形成與實施**（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二年八月），第二、三章，頁一五～六五。

註³¹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之間，台灣出國留學生占大學畢業生總人數 22 %，而一九六〇年代至一九七〇年代，海外留學生返台者不到 10 %。請參閱許擇昌，**從留學生到美籍華人：以二十世紀中葉臺灣留美學生為例**（台北：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民國九十年），頁二二～二四；鑽天錫、全煥模、張丕顯，前引書，頁一〇三～一〇七。

註³² 有關一九六〇至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經濟建設、人力規劃、教育的關係，請參閱王麗雲，「台灣高等教育擴張中國家角色分析」，**國立中正大學學報**（社會科學分冊），民國八十八年第十卷第一期，頁一四～一六。

註³³ 請參閱楊艾俐，「掀起人才回流浪潮」和王行，「人才胡不歸？」，**天下雜誌**，第二十五期，民國七十二年六月一日，頁一～二四。

(二) 第二階段（一九八〇年至今）： 大陸英語教育的急起直追 vs 台灣的停滯不前

一九八〇年代初，台海兩岸的政治環境出現極大的變化，大陸從政治掛帥、仇視美國和鎖國的時代走入經濟改革開放的新紀元。

自經濟改革政策推動以來，中共就推動專業人才兼差、轉換工作單位，大學畢業生和徵才單位「雙向選擇」、聘用合同制、人才交流會等辦法，並藉著改革所引發的各類爭議，灌輸大陸社會人力資源的觀念^④。一九九二年擺脫天安門事件的陰影之後，中共加速推動市場經濟，一邊從事勞動力市場的建立，一邊以發展科技與世界潮流接軌為導，致力提昇菁英大學的地位和高等教育的發展。前者包括了公務員制度、培訓制度、工資制度改革，以及人事行政組織架構的建立。一連串的改革，再加上大陸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快速擴大、外資企業的高薪挖角的不斷衝擊，使得一九八〇年代已開始鬆動的大鍋飯制度和部門所有制度，逐漸瓦解。至於高等教育，質與量的發展同時並進：一方面，學費制的推廣令招生人數直線上升，另一方面「211工程」和一連串獎勵措施的推出，激勵了原本改革相對落後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在薪資、獎勵、人事升遷等制度上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成為社會改革的先鋒。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之後，大陸引入知識經濟理念，將發展科技學術，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目標，從原先的與世界潮流接軌，提升到能在世界占一席之地，並積極推動發展世界一流大學和學術研究。人才培育政策的重心亦從四年本科教育提升到研究生教育，又啟動「引進外智工程」，以各種優待政策鼓勵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滯留海外的留學生返回服務。

相對的，台灣開始從威權體制走向民主化，隨著社會多元化發展的提昇，國家介入的能力逐漸弱化，人力資源發展的策略也出現了另一番景象：

1. 台灣人力規劃模式的式微

首先，四年一期的經建計劃，因世界經濟的變化和國內十項建設工程的進行，出現難以為繼的現象，幾經修正^⑤。其次，從歐美地區回流至大學執教的學者，對於舊時的人力規劃模式提出質疑，指責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人力規劃，再加上教育分流政策，造成了「菁英主義教育」，並批評職業教育導向的政策非但未能紓解升學競爭，反因五專與公立大學的懸殊差距，使之惡化。因此，他們提出教育機會均等、教育資

註④ 以下有關大陸人力市場的變化和高等教育的發展，請參見王瑞琦，「論『文革』後大陸人才資源配置」，前引文；王瑞琦，「九〇年代大陸高等教育發展之研析」，*中國大陸研究*，民國八十九年四月，第四十三卷第四期，頁五九～八〇。

註⑤ 如一九七三年擬定的四年一期經建計劃，修正為至一九八〇年的六年計畫。見鎮天錫、全煥模、張丕顯，前引書，頁三二。

源公平分配、廣開大學之門等理念^{③⑥}，強力推動教改。一九八五年立法院通過解除私立大學新設的禁令被林本炫視為是舊時期人力規劃理念潰敗的指標^{③⑦}。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台北市三萬民衆走上街頭要求教改，之後「教育改革諮詢委員會」成立，並在兩年後提出總諮議報告書，從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技化，以及國際化五個角度重新為教育定位，強調學習者潛能和自我的發揮與實現^{③⑧}。新的定位為早已式微的人力規劃模式畫上了休止符，教育發展與政府的人力發展也自此分道揚鑣。

2. 台灣人力資源發展政策的失焦

自一九七〇年代後期，台灣的人力資源政策開始偏向理、工、農、醫科技術和科技人才的培育。一九八〇年代前期，政府曾三次公佈中、長程經濟計畫，但是這些計畫均只是強調高等教育的擴張。一九九〇年代人力規劃政策受到排斥之後，政府亦曾提出發展亞太營運中心，推動經濟發展國際化，以及國際化人才培育的政策，學界並為之提出建言^{③⑨}。然而，此時正值國內政爭，台海關係重新定位之中，國際化政策推出未幾，就陷入本土化與去中國化的爭議的泥淖之中^{④①}，國際化人才培育的內涵一直未能夠具體化。當此之際，高等教育界將大半的精力投入在高等教育的擴張和校園民主化，對於如何提昇學術研究、改革或調整課程以應國際化潮流、或就業市場的急速變化等急迫性的議題鮮少觸及^{④②}，也未能即時支援受挫的人才政策。一九九〇年代後期，民進黨政府提出了「科技島」的願景，範疇卻大幅縮小，將焦點放在資訊科技產業和近年的「生物科技人才」的培育。

兩岸的政治、人力資源發展政策的轉變，明顯地反映在各自的英語教育和人才發展。一九八〇年代，隨著大陸改革開放政策幅度的擴大，英文教育在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出國留學或是進入高薪的外資企業是青年學子苦讀英文的主要動機。一九九〇年代，市場經濟展開之後，具有英語溝通能力，從事經貿、科技等所謂「外向型人才」

註^{③⑥} 有關人力規劃的批評和教改的建議，請參見教改會秘書組，「『鬆綁』原則研究計畫案」，**教改通訊**，第三期，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引自賀德芬編著，**大學之再生—學術自由·校園民主**（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年）；台灣研究基金會，**台灣的教育改革**（台北：前衛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王震武、林文瑛，**教育改革的台灣經驗—國民教育的政策及行政措施分析**（台北：業強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註^{③⑦} 林本炫，「當前學費政策的背景分析」，**國策專刊**，第五卷，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頁四~六。

註^{③⑧}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教育改革總諮議總報告書**，民國八十五年。

註^{③⑨} 請參閱趙必孝，「我國因應亞太營運中心的人力資源規劃」，**勞資關係月刊**，第十五卷第八期，民國八十五年，頁四六四~四七三；簡建忠，「人力資源發展對亞太營運中心之影響」，**勞資關係月刊**，第十五卷第八期，頁四五四~四六三；張丕繼，「人力發展展望」，**研考雙月刊**，第十九卷第六期，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頁一三~二一。

註^{④①} 如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七日，第十一版，**中國時報**以「吳大猷：過度本土化如關門做皇帝」，「李遠哲：無法立足台灣，如何國際化」為題，報導學術本土化與國際化之爭。

註^{④②} 請參閱藍科正、林嘉慧、吳惠林，「台灣的高級人力資源預測」，**教育研究資訊**，第三卷第五期，民國八十三年九月，頁一~一六；王昭蓉，「台灣地區民衆失業率與高教低就之研究」，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炙手可熱，並成爲中共人力資源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又因高等教育高速擴張，大城市的就業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企事業單位進用新人的條件不斷提升，學歷從四年本科畢業提高到碩士或碩士以上，各種專業的證照，尤其是鑑定大學英文能力的四、六級考試合格證書成爲必備的條件之一。爲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得競爭優勢，許多大學生踏入大學之門後，就投入大量的金錢和時間，補習英文、電腦等，以通過各項鑑定考試^②。

相較之下，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的台灣社會發展存在著諸多不利於英語教育發展的因素。首先，在教育方面，自教育部配合發展亞太營運中心政策，宣布從二〇〇一年起英語將成爲小學中的必修課程之後，台灣學界和社會就因教育理念和 cultural 認同爭辯不已。前者包括師資、教材不足、幼童學習外語的起始年齡等，後者則是擔憂外來文化對於本國文化認同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③。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文化認同的議論因中文譯音拼音系統的採用，轉爲激烈的「本土化」和「去中國化」的爭辯^④。在產業界方面，雖然海外人才回流帶回了知識、科技和國際視野，推動台灣從勞力密集轉入科技產業^⑤，但是這些人才聚集在資訊、電子等高科技產業，其他產業仍面對著國際管理人才匱乏的窘境^⑥。高科技產業以誘人的高薪，取代了銀行業和外商，吸收了衆多擁有碩士學歷或以上的菁英，創造了「科技新貴」，卻也令衆多菁英大學學子，放棄成本高、回收不確定的留學深造，進入科技產業^⑦。儘管就業市場對於學歷的要求從學士上提到碩士或碩士以上，但是在進用新人時，除了少許國際市場推廣的職位，企業主要是技術取向，英語能力次之。企業界重技術輕英文，求職者自然不願投入時間和金錢強化自身的英文能力。

四、兩岸英語教育的發展

大陸英語教育，自一九八一年自費留學政策實施之後，開始快速發展，至一九九

註② 湖南大學曾對學生學習英文進行問卷調查，回答者中 60% 選擇就業後找理想工作，44% 爲應付過級考試，12% 爲考研究所，9% 爲了解英美，4% 爲出國留學。見龔修煥，「大學英語過級考試引起的思考」，*黔西南民族師專學報*，二〇〇一年第二期，六月，頁六一～六八。

註③ 如毛連塢、湯梅英，「兒童學習英語之時機成效及相關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第二十三卷，民國八十一年，頁二三～三六。「贊成小學開設英語課程者則強調國際化的潮流、國家經貿政策的配合，以及社會、家長的需求」，見陳春蓮，*小學外語教學之研究*，國立台灣師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石素錦，「從國小英語教學談師範師資培育與因應之道」，*教育資料與研究*，第二十四期，民國八十七年，頁一一～一四。施玉惠等，*國民小學實施英語教學之可行性探討*（台北：教育部編印，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註④ 對於中文拼音政策的爭議，請參閱王麗雲，「中文拼音政策的爭議與課程政治面向的反省」，*教育研究集刊*，第四十八輯第一期，二〇〇二年三月，頁九八～一三一。

註⑤ 王維貞，「從各國科學與工程博士培育看高階科技人才流動」，*科技發展政策報導*，SR9009（二〇〇一年，頁六九五～七〇三）。

註⑥ 趙必孝，前引文。

註⑦ J. Kinoshita, "Counting on Science to Compete," *Science*, 262 (5132), 1993, pp. 348~350.

五年之間，中學英語教師人數從 259,054 人增加至 423,909 人，成長 93.9 %^{④⑧}。近幾年，大城市的英語教育已延伸至幼稚園的階段。台灣方面，台北市於一九九三學年度起，開放各小學自行規劃英語教學，至一九九七學年度，75 % 的小學（共 112 所）參與試辦。次年，配合亞太營運中心政策，全台灣小學五年級開始實施英語教學，與之同時，台北市的小學三年級學生開始每週有兩節的英語課程^{④⑨}。

整體而言，在師資、教學方法、或教學資源等方面，台灣的英文教育仍優於大陸，但是從人才資源發展策略的角度觀之，中央集權、朝菁英發展模式的大陸，在建立教學制度上，顯然比台灣積極而有效率。

(一) 兩岸中小學英語教育的現況

教師嚴重不足是大陸中小學英語教育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根據一九九九年一項粗約統計，如果大陸從小學四年級開始英語教育，並以每三十個學生配備一位英語教師的標準計算，小學英語教師將立即出現五十多萬名的缺額^{⑤⑩}。第二個挑戰是師資素質偏低。中共「國家基礎教育實驗中心外語教育研究中心」祕書長包天仁指出，二〇〇二年大陸的中學英語教師達五十多萬人，小學二十多萬人，另有萬餘位英語教學研究員。但是在龐大的教師隊伍中，泰半畢業於一九七〇年代末，僅接受一些基本的培訓課程，英文能力和教學方法上均待提升^{⑤⑪}。更嚴重的是，許多教師以地方方言教學，使得英文發音和腔調的準確成為中、小學英文教學最弱的一環。師資不足與偏低使得一九九六年修正的新教材難以發揮功效^{⑤⑫}。

第三個挑戰是受到惡性升學競爭影響，揠苗助長的情形相當嚴重^{⑤⑬}。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城鄉發展差距過於懸殊，城市與偏遠地區的英語教學資源、師資和發展有天壤之別。例如，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英語教育自幼稚園開始，公立的中學也和英、美教育機構合作，進行雙語教學和培訓教師，近年貴族的雙語私立學校發展尤其快速^{⑤⑭}。但是，出了廣州市，位於郊區的中、小學校，就已有教材、教師不足的問題，

註④⑧ 胡德映，「中國英語教育九十七年回顧」，*山東外語教學*，一九九九年第四期，頁五七。

註④⑨ 陳春蓮，「小學外語教學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八十九年；施玉惠等，*國民小學實施英語教學之可行性探討*（台北：教育部，民國八十七年）。

註⑤⑩ 陳荷榮，「培養跨世紀的英語教育人才」，*孝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十九卷第三期，一九九九年八月，頁八一～八四。

註⑤⑪ 「一項專業考試顯示中小學英語師資水平較低」，*中國青年報*（北京），二〇〇二年六月十三日，第五版。

註⑤⑫ 二〇〇二年六月初，作者曾參加華南師範大學主辦的雙語教學國際研討會。研討會中受邀的學者們均注意到，負責廣州江門市江華小學和幼稚園的雙語教育觀摩教學發表會的菁英教師，最大的弱點就是發音不準確。另見汪寶榮，「論困擾中學英語教育的四大誤區」，*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第二十卷第一期，二〇〇〇年三月，頁一〇五～一〇八。

註⑤⑬ 最常見的方式就是增加學生英文詞彙，並提前完成課程，最典型的例子是北京私立匯佳學校以「新型、高品位、國際化」為訴求，要求每個學生每年要加增 1000 詞彙量，並將原先六年的語、數基礎課程縮至 5 年，以便最後一年集中時間強化英語。見*光明日報*，二〇〇二年六月十三日，<http://www.wisers.com>。

註⑤⑭ 「南開雙語教學蒞港澳取經」，*文匯報*（香港），二〇〇二年三月五日；「培育國際通用人才—中學教育國際多元化透視」，*福建日報*，二〇〇二年四月四日，<http://www.wisers.com>。

而粵北和其他省市的貧困地區的英文教育發展就更艱難⁵⁵。由於師資不足，大多學校以擴大班級容量，或由非英語專業畢業的教師兼任因應，或延緩實施英語教育⁵⁶。造成揠苗助長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在於中共一胎化政策，導致父母對兒女的高期望。

同樣的，台灣的中學英語教育也一直未能從升學考試的陰影跳脫出來。小學英語教育自一九九〇年代初開始規劃，因前述的各種爭議，直到二〇〇一年才從各別縣市試辦的階段進入到全面實施。現今，少數積極的私立學校和公立學校已朝向雙語教學的目標發展，成效則尚待觀察⁵⁷。

根據戴維揚的研究，現今台灣小學英文的師資來源充沛，比一九九八年改善許多，包括合格的英語教師、英語系國家學成歸國的學、碩士生和來台留學生、本土大學英語系畢業生，以及外籍適任教師。師資培訓的管道也甚多：大學合作、民間教育機構、研討會、研習會、英語國家培訓、在職進修、自學等⁵⁸。一九九九年，台灣首次舉行國小英語師資能力檢核測驗筆試，試題難度與托福考試相當，錄取率僅 5.5%，台北市並宣布自二〇〇三年起，英語能力將成為中、小學教師甄選的項目之一⁵⁹。不過，據報導，台北市、縣分別將於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年起，一至六年級將全面實施英語教學，預期屆時師資將出現緊缺的現象⁶⁰。另外，地處偏遠的縣市，因合格教師拒絕前往，師資嚴重不足⁶¹。除了師資和升學競爭對於中學教育的影響，台灣中、小學階段英文教育的發展，因社會的多元化的發展，正面對著多項棘手的問題：如學生程度參差不齊、大班教學⁶²、各地方英語教學的準備進度不一⁶³，以及近幾年通用、漢語拼

註⁵⁵ 陳荷榮，「培養跨世紀的英語教育人才—我國中小學英語教師現狀與未來」，*孝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十九卷第三期，一九九九年八月，頁八一～八四。

註⁵⁶ 大陸某一省的中學英語教師中，只有 48.3% 符合規定本科畢業，46.2% 專科畢業（其中 60% 左右，是透過函授、電大等方式取得證書），5.5% 畢業於中師，研究所學歷者為零。該省因師資不足，省級以下的市、縣小學幾乎都未能設置英語課，請參閱陳荷榮，前引文。

註⁵⁷ 李秀芬，「學科內容本位之英語教學課程」，*教育研究月刊*，二〇〇二年第八期，頁一二九～一四三。

註⁵⁸ 戴維揚，「國小英語課程的沿革與展望」，*中等教育*，第五十三卷第二期，民國九十一年，頁三二～五一。

註⁵⁹ 陳曼玲，「小英師資筆試考題難度可比托福」，*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轉引自*教育資料文摘*，民國八十八年四月號，頁一二二～一二四。「北市教師甄選明年起參酌英語能力」，*中央日報*，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第九版。

註⁶⁰ 「教局：鄉土語言教學沒少」，*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十九版。

註⁶¹ 如澎湖縣 41 所學校僅有 3 名合格認證的英語教師；台東縣則是 2 至 3 個學校被迫共聘一位教師，新竹縣十幾個小學去年一年未能找到合格教師，見「英語師資下鄉，教部有請外籍兵團」，*中央日報*，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第九版。

註⁶² 見吳俊憲，「小學實施英語教育的困境與突破」，*國教世紀*（新竹），第一九五期，二〇〇一年四月，頁二四～二八；「國小英語教學問題多多」，*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十日，第十七版。

註⁶³ 一些縣以鄉土語言為優先，至民國九十年才開始試辦、規劃小學英語教育，見張湘君，「89 學年度台灣北區各縣市國小實施英語教育教學情況報告」，銘傳大學應用英語系編，*第十八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鶴出版社，民國九十年，頁五五三～五五七；沈添鈺，「台灣中區各縣市國小英語教學現況與問題」，前引書，頁五五八～五六一；蘇復興，「台灣南區各縣市國小英語教學實施現況與問題探討」，前引書，頁五六二～五六四；曾月紅，「台灣東區各縣市國小英語教學實施現況與問題探討」，前引書，頁五六五～五六九。

音政策的激烈爭辯，和國語、英文、鄉土語文教育之間的定位問題^④。

(二) 兩岸大學英文教育的發展

大陸大學的英語教育發展遠比中、小學發展快速。首先，在學程上，從各大學的公共英語課、英語專業為起點，擴張至今日的外國語學校的英語教育、廣播、函授英語教育、自學英語教育。一九九七年大陸的外語院校和外語專業的學校多達 300 多所，外語專業在校人數達 75,500 人；外國語學校達 40 多所^⑤。大陸的研究所均開設專業英語課程，博士生尚需修第二外語。

大陸大學英語教育的發展以教學大綱和英語能力鑑定考試為主軸。大陸各科的教學都是統一教材，所有課程均有統一的教學大綱。經濟改革之後，一九八〇年有「高等學校理工科公共英語教學大綱」的出版，經多次修正，現今使用的是一九九九年的版本。

英語能力鑑定考試分兩種。一種是一九八六年開始實施，以一般大學生為對象，分四、六兩級，簡稱「四、六級統考」(CET)。第二種是以英語系學生為對象，一九九〇年開始實施，定為八級能力鑑定的「英語專業等級考試」(TEM)。歷經十多年的發展，四、六級統考至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已建立其公信力，不僅學生通過的比率成為各大學英文教學質量、教師教學效果，和學生英語水平的重要指標；四級的合格證書也成為大學生領取畢業證書、報考研究所的基本條件之一，以及大城市中眾多企、事業單位進用新人的主要考量因素^⑥。凡此使得鑑定考試成為英語教育推展的主要動力，卻也將大學英語教育導向應試教育：教師以模擬考試取代近年新編、評價頗高的六冊的大學英語統一教材和教學大綱；學生以補習班為主，學校課堂次之^⑦。對許多教師和學生而言，通過檢定考試（通常在大學二年級結束），代表著英語教學和學習的結束，因此和台灣一樣，許多教育人士抱怨大學生畢業時英語水平反而下降^⑧。

註④ 如台北市決定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令一些人士擔憂將不利於鄉土語言的教學，見「英語當道母語閃邊」，**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十九版。

註⑤ 胡德映，前引文，頁五五、七四。

註⑥ 關躍明、陸琳，「大學英語四、六級統考的正負效應」，**雲南師範大學學報**，二〇〇〇年四月，頁一四八～一五〇。

註⑦ 如二〇〇二年五月底，武漢理工大學信息工程學院宣布，將以 1200 元和 2000 元人民幣，獎勵四、六級通過率較高的班級和個別高分的學生。見**中國青年報**，二〇〇二年六月四日，第五版。段嘉芊、周廣榮，「『大學英語』與四、六考試的相關分析」，**雲南民族學院學報**，二〇〇二年第二期，頁一一五～一一八。

註⑧ 關於四、六級統考的影响，請參閱李炯英，「中國現行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問題與思考—兼評國內外相關研究」，**外語教學**，二〇〇二年第二十三卷第五期，雙月刊，頁三三～三八；何淑貞等，「我省高校英語水平等級考試的現狀分析及對象」，**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〇〇一年第三期，頁一六七～一七〇；徐春霞、高平，「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斷想」，**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〇〇一年三月，頁一三四～一三六；田珂，「關於大學英語教學幾個問題的探討」，**遼寧教育學院學報**，第十七卷第六期，二〇〇〇年十一月，頁七一～七三。

過去十年，台灣各大學英文的教育發展可以說是不進反退。一九九〇年代初，教育部為推動國際化，一方面在高中設立第二外語選修，另一方面不顧專家學者的反對，將「大一英文」改成「外文」；將大學原來的八學分英文課程減為六學分，最後減至四學分，以便讓學生在「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等外文中擇一修習」，同時英文聽講實習也從必修變成選修^⑥。政策的調整令長久來因被定位在共同科目，原本就發展有限的大學英文教學，失去了唯一的優勢，而其他第二外語，由於各方條件不足，推動多年，至今仍是原地踏步，不僅未能如當初一些學者所期盼與英語並駕齊驅^⑦，反如彭鏡禧所言成為英文程度偏低的學生的避風港^⑧。大一英文課程時數縮減，專業英文教科書譯本盛行。本土碩、博士生教育雖然高速成長，大學校園國際化的發展卻是牛步，各校的碩士班招生考試中，英文成績或是不計分，或是僅作參考，即使計分，比重亦低^⑨；博、碩士生不需修第二外語課程，英文課程缺乏規劃，流於形式。凡此種種，再加上就業市場技術掛帥，自然令絕大多數的中學生在踏進大學校門後，放棄了多年苦讀的英文。

五、兩岸民間英語人才培育資源的發展

與學校教育相較，在提昇英語能力上，民間培育機構的角色更是重要，不僅反映英語在社會中受到的重視程度，也顯示其具有的發展潛能。本論文的重心在人力資源的發展，因此在這部分中亦著重在從民間培育機制的發展看兩岸英語人才資源的儲備。

(一) 兩岸民間英語學習資源

經過四十多年的經驗累積，台灣學習英文的社會資源相當豐富，從各類民間教育機構、各大學的英語推廣課程、社區大學、廣播教學、網路資訊等，以至於近年流行的不同年齡層次的遊學均可補學校英語教育的不足^⑩。一九九九年，借助於英語教育的熱潮，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終於獲得教育部的委託，開始建立策劃多年的全民英文能力檢定考試。

至於大陸，英語培訓則是一個新興市場，一九九八年廣州、上海、北京私立語言

註⑥ 請參閱周先例，「大一英文教學之檢討」、「英文組結論報告」，**大專院校共同科人文課程教學改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頁六五～八一；「大學修英語提升競爭力」，**民生報**，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八日，引自**教育資料文摘**，民國八十八年三月號，頁一三三～一四五。

註⑦ 蘇復興，「評國、高中開設第二課程」，**國立編譯館通訊**，第八卷第一期，民國八十四年，頁四三～四五。

註⑧ 「大學修英語提升競爭力」，**教育資料文摘**，民國八十八年三月號，頁一三六。

註⑨ 以民國八十八年，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元智大學、東海大學 4 所大學的碩士班招生考試為例，只有政治大學將英文列為所有系所的必考科目；東海大學，除物理、化學、生物所，各系皆考。但 2 所大學，英文成績比重均低。台灣大學僅一些專業需求的科系如語言學研究所、音樂學系、新聞所等將英文列為必考。元智大學，除管理系、藝術管理系、資傳所資訊傳媒組外，各所皆不考英文。

註⑩ 謝凌惠，「英語國際掛帥，補教相輔相成」，**中央日報**，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第十三版。

學校數分別有 122、56、78 所，合資的語言學校數分別為 12、23、5 所^⑦；二〇〇二年英語成爲「百億巨大產業」，英語培訓機構超過 3000 家，其中三分之一強在上海，該年，2200 餘名外籍教師湧入北京市，北京市並將開放外籍留學生教學，以應社會的需求^⑧。

二〇〇〇年，大陸英語能力鑑定考試向下延伸至學童，每年考兩次，由於通過的證書據稱是世界認可，可藉之入讀國外學校，在大陸掀起兒童考證的熱潮，被引入的「劍橋少兒英語三級水平測試」體系的英語教學亦趁機進了小學校園^⑨。目前，大陸英語培訓班有國有公辦、國有民辦、民有民辦，以及合資合辦，良莠不齊，尚需市場的淘汰。

(二) 兩岸英語人才的儲備

台灣雖然在英語學習環境和資源上仍擁有優勢，但是在英語人才的儲備方面卻明顯地面對著來自彼岸的挑戰。大陸英語人才資源的優勢可從以下三方面窺之：

1. 各種專業培訓課程的發展

爲了面對世界的挑戰，台灣知名的企業開始遣送職工至海外接受培訓，也與知名的「空中英語教室」合作，成立訓練課程，但是資源和格局明顯不及大陸。**Goldsten** 和 **Anderson** 指出，自大陸決定申請「入世」，爲搶先機，美國和西歐其他國家、亞洲開發銀行、美國菁英大學，以及各國的非官方專業機構，競相爲大陸官員和產業菁英提供各種的培訓課程。這些課程的範圍廣闊，從法律、經濟、智慧財產權，以至研究、語言等，並在大陸「入世」之後，快速擴張^⑩，目前跨國公司所設立的研究機構、跨國人力資源培育機構舉辦的各種培訓班，以及國際知名的教育機構與大陸菁英大學合辦的各類培訓中心已超過百所^⑪。這些均有助於大陸人力專業素質的提升、國際視野的拓寬，尤其是英語語文的推展和中、英文同步翻譯人才的培育^⑫，已被大陸人士視爲二十一世紀大陸國際人才培育的搖籃。

註⑦ 龐紅梅，「中國英語教育發展趨勢」，*清華大學教育研究*（北京），二〇〇一年第三期，頁一四八～一五〇。

註⑧ 「群雄爭奪百億英語教育蛋糕」，*文匯報*（香港），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英語培訓市場『蛋糕』誰能分享」，*經濟日報*（北京），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九日，<http://www.wisers.com>。

註⑨ 二〇〇二年共有 8 萬名 6～12 歲的考生參加三月的春季考試，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58%，見「英語考級低齡化是喜是憂？」，*新快報*，二〇〇二年六月十八日，<http://www.wisers.com>。

註⑩ 二〇〇一年，美國政府所支持的課程達 23 個，一九九八年至今，英國、德國、日本等支持 10 個左右；非官方，如亞洲業金 (Asis Foundation)、世界銀行 (World Bank)、哈佛大學等。見 Brian L. Goldsten and Stephen J. Anderson, "Foreign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WTO Capacity Building,"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2, pp. 8~15.

註⑪ 劉方永，「國際教育機構『開疆拓土』」，*中國青年報*，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七日，第五版。

註⑫ 焦紅艷，「中國培訓市場十大現狀」，*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複印報刊資料），二〇〇二年第七期，頁六～七。

2. 外資企業的發展

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高薪的外資企業就吸收了大陸各名校的畢業生。二〇〇〇年，港澳台企業和外資企業中，大陸本土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達 **210.9** 萬人，其中 **22.4 %** 具大學學士以上的學位，**62.5 %** 的年齡在 **35** 歲以下^⑧。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大陸大城市的就業市場挖角之風盛行，爲了留住人才，外資和大型企業，除了晉升、加薪，紛紛提供職工英語語言、專業等培訓課程。此外，二〇〇一年美國從海外引進 **11.5** 萬名持 **H-1B** 簽證的高科技人才，其中 **10 %** 來自大陸^⑨。以上這些在外資企業接受過培訓和歷練的人才，已被視爲大陸本土企業發展的主要人才資源。

至於台灣，自一九九一年至二〇〇〇年，外資投資件數或金額多呈穩定成長，但在二〇〇一年均明顯下降。該年核准外資件數是 **1178** 件，投資金額 **76.07** 億美元，分別較上年減少了 **16.45 %** 和 **32.58 %**。就台灣人力資源的發展而言，外資的降低勢將難免產生負面的影響^⑩。

3. 海外留學生的發展

近幾年，台灣海外留學生人數縮減和我大學生托福成績的偏低，令學界和產業界爲台灣人才競爭優勢的漸失頗感憂心^⑪。大陸的情形恰好相反，自一九八〇年代初開放海外留學以來至一九九八年，大陸出國留學人員約 **30** 萬，其中自費出國留學約 **15.4** 萬人^⑫。王希指出，大陸留學生中以留美的人數最多，學科範圍廣泛、學位層次高、學術成就亦比較明顯，自一九八五年放寬自費留學生管理後，人數大增，並於一九八九～一九九〇學年超過台灣留美學生人數。至二〇〇一年已成爲台灣的兩倍，若再計入香港的留學生人數，台灣的劣勢就更明顯了（見表一）。

一九九二年，推行市場經濟之後，大陸開始逐漸放寬私費留學政策，留學生的年齡亦因大陸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逐漸下降。小留學生市場發展的潛力令大陸成爲歐美國家的中、小學招攬學生來源的主要標的。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之後，在大陸海外學人的呼籲下，中共對於滯留海外的人才，從批判和限制，逐漸朝向「開發、利用和發展」的策略調整^⑬。一九九〇年代後期，

註⑧ 非公有制企業人才調查課題組，「非公有制企業人才調查狀況」，*中國人力*，二〇〇二年第七期，頁四～七。

註⑨ 黃津孚，「WTO與人才戰略」，*經濟管理*（北京），二〇〇〇年第五期，頁六～一一。

註⑩ 劉任，「150大在在外資企業」，*貿易雜誌*（台北），第一〇六期，二〇〇二年八月十六日，頁八。

註⑪ 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李振清指出，台灣托福考試成績全亞倒數第4名，見「搶救英語能力大學備戰」，*台灣立報*，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五日，<http://www.wisers.com>；請參閱林安樂，「台灣傳統產業的困境與脫困」，*經濟前瞻*，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五日，頁七〇一～七七四。

註⑫ 榮芳、趙勁松，「我國人力資本外流的成因分析及對策建議」，*科學與科學技術管理*（天津），第二十一卷第十二期，二〇〇〇年，頁一〇～一四。據之，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八年之間，返回大陸的公費留學生統計數字如下：美國 **18.8 %**，日本、加拿大、英國分別爲 **50 %**，英國、澳洲、法國均在 **60 %** 以上。

註⑬ 請參閱 Cao Xiaonan, 前引文；李其榮，「對中國『腦流失』的有益探索－評中國腦流失在美國－90年代中國學生、學者的觀點」，*華僑華人歷史研究*，一九九七年第四期，頁五八～六〇。

藉著北京市爭取二〇〇八年奧運會主辦權和大陸申請「入世」，中共轉以國際化、全球化等世界潮流為訴求，將人才戰略的基點調整為培育「數以億計高素質的勞動者和數以萬計的專門人才」。上海、北京市等大城市相繼推出「人才高地」的策略，調整長久以來的「排外」（其他省市）政策，向大陸各地菁英，尤其是海外學子，打開大門^⑥。據中共教育部的統計，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之間，大陸留學生回流每年平均以 13 % 的速度遞增^⑦，相較於一九九〇年返回大陸的學者僅 1593 人，一九九八年人數已躍增至 7379 人^⑧。

表一 台灣、中國大陸、香港留學美國大學的學生人數 (1980~2001 年)

單位：人數

學年度	台灣	大陸	香港
1980/81	19,460	2,770	9,660
1984/85	22,590	10,100	10,130
1987/88	26,660	25,170	10,605
1988/89	28,760	29,040	10,560
1989/90	30,960	33,390	11,230
1990/91	33,530	39,600	12,630
1992/93	37,432	45,126	10,018
1993/94	37,581	44,381	13,750
1994/95	36,407	39,403	12,935
1999/2000	29,234	54,466	7,545
2000/2001	28,566	59,939	7,627

資料來源：1. 王希，「留學生資源的開發、利用、保護和發展」，當代中國研究，一九九六年第三期，頁一二六；
2. IIE., *Open Doors 2002* (New York), p. 8；教育部國際文教處 <http://www.edu.tw/bicer/chinese.htm>。

六、加入 WTO 之後，兩岸英語人才培养的策略

二〇〇一年末，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兩岸從不同的角度積極推廣英語教育。「入世」之前，大陸的學、官就從經濟、法律、人才等層面分析和探討因應之道；「入

註^⑥ 湯華，「構築新世紀我國人才制高點」，瞭望新聞，二〇〇〇年一月七日，頁三～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取消九〇年代中期以來，對於留在本地工作的非本地戶籍的大學或研究所畢業生採取的限額政策和徵收留下就業者巨額城市「增容費」。以上請參閱「滬寧杭爭奪優秀學子」，中國青年報，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五版；袁夢德，「趕進浦江？登上人才高地」，中國青年報，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第 B3 版。

註^⑦ 周大平，「新一代留學生回國圖甚麼」，瞭望新聞，一九九九年第十四期，四月十五日，頁四六。

註^⑧ Brook Larmer, "Home at Last," *Newsweek*, July 31, 2000, pp. 11~14.

世」之後，更從培育國際化人才的角度著手，以培育專業知識和外語，尤其是以中英語能力兼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菁英為目標，擬定二〇〇二～二〇〇五年的人才隊伍建設總體目標^⑧。

近幾年，台灣學界和企業人士對於大學生英語能力偏低予以高度的重視。二〇〇一年，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中，國立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教授即言，「因應國際化的潮流，英語能力是決定勝負的關鍵之一」^⑨。二〇〇二年，遠見雜誌電話訪問台灣 867 家上市、上櫃公司，在回收 591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台灣的大學生應加強的五項能力中，61.6 % 以英文溝通列為第一優先，遠高於第二名的專業反應 (44.3 %) ^⑩。企業界許書揚先生指出，企業所要的人才就是「高學歷、英文流利、態度積極進取，並具備國際觀」^⑪。同年五月，我行政院通過「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2002～2007)」(以下簡稱「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將英語教育的推廣列為「E 世代人才培育」中的主要課題，強調培育具有創意及國際對話能力，能夠嫻熟應用資訊和英語的新世代。又另行建立「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篇章，研擬國際化人力資源之發展^⑫。

對於英語人才的開發，兩岸同步加強英語教育，並積極延攬海外人才，以下分別述之。

(一) 加強英語教育

大陸因資源分配不均，仍著重在各地區各級菁英學校的英語教育的提升，主要從教學和課程的提升和考試制度的完善著手。

1. 教學與課程的提升

如推動小學、中學、大學共同英語教學教材、教學方法的整合，各級菁英學校與英、美學校合作，以及完善的各級英語能力鑑定考試制度。自二〇〇一年起，大陸開始選送 100 名中、小學優秀教師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進修。考試內容包括聽、說、讀、寫、譯五項，總分 150 分^⑬。

註^⑧ 培育國際型人才已成為大陸顯學，囿於篇幅，不在此贅述，最新的相關政策，請參閱「人才戰略細化政策思路」，瞭望新聞，二〇〇二年第二十五期，六月十七日，頁二六～二八。

註^⑨ 李振清，前引文。

註^⑩ 其它 3 項依序為溝通與表達能力 (31.5 %)、團隊精神 (29.1 %)、前景 (21.4 %)，見林婉蓉、徐嘉卉，「兩岸人才直接過招」，遠見，二〇〇二年二月，頁一〇〇～一〇五；施鈺文，「台灣高階經理人為大陸企業打拼」，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年八月十三日，第十一版。

註^⑪ CHEERS 編，「搶不走的優勢：兩岸人才大車拼」，前引書，頁二。

註^⑫ <http://www.cepd.gov.tw/service/board/coun-dev/>國發計畫 0617 核定版.pdf

註^⑬ 兩年報考的考生集大陸中小學英語教師菁英各兩百多人，第一年平均 85 分，今年僅 80.27 分，由之亦可見師資水平的急待提升，見「一項專業考試顯示中小學英語師資水平較低」，中國青年報，二〇〇二年六月十三日，第五版。

自一九九九年起，大學英文教學重心從閱讀開始轉向口語英語的訓練^⑤，並分成基礎（一至二年級）和應用提高（三至四年級）兩階段。前者要求不少於 280 個學時，每週最少 4 學時；後者 100 個學時，每週 2 個學時^⑥。近年，大陸又為研究型 and 一般大學作出不同定位，前者將推動中英雙語教學，其比例在三年內將達到總課程的 10%；後者將以實用性英語教育為主^⑦。

2. 考試制度的改革

首先，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上海、廣東等地區的大學入學考試於一九九〇年代初開始試行「3+x」入學考試模式的改革方案，於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全面實施。新模式的最大特色是將英文、數學、國文列為三科必考科目，取代了過去包括英文、日文、俄文等多國語文的外語科目考試。其次，自二〇〇〇年起，大學招生考試英語科增加聽力測驗。由於各地區發展不同，中共「教育部」還提供四種部分百分比不同的試卷，供各地區選取。

同樣的，大學的英語能力考試亦見調整。一九九九年五月和十一月，北京、上海、武漢、南京等城市及數所大學的四、六級統考加考口試，次年擴及至各大城市，至今已在 26 個城市設置口試考點^⑧。近年，又針對不同層次的高等院校的學生採取不同的試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八所研究型大學，提高寫作、問答題等主觀試題的百分比；一般院校仍按昔日的方式進行^⑨。自二〇〇二年起，碩士班統一考試中，英、日、俄三種外語科目加考聽力，不計入外語成績，供招收學校參考^⑩。

資源豐厚的台灣，以社區大學和網路教學為軸心，推動全民學外語、標示英語化、中小學英文教育的提升、終身教育，以及城鄉英語教育資源的平衡。進展最快的是「全民英檢」現已完成初級、中級、高級及優級的測驗。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日，在接受教育廣播電台訪談時，該中心副主任吳若惠指出，「全民英檢」自推出至今已達 32 萬人次報考，並成為多家公民營機關選才和評鑑的根據。現已確定，二〇〇三學年度起，「大學推薦甄選入學招生英語聽力測驗」亦將改由「全民英檢」中級或以上級數之初

註⑤ 高旭陽，「大學英語分級教學改革的探索與思考」，*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〇〇一年第二期，頁九八～一〇〇；何琍，「WTO 對大學英語教學的挑戰」，*學術探索*，二〇〇一年五月，頁二〇七。

註⑥ 謝邦秀，「中國大學英語教學大綱介評」，*北方論叢*（黑龍江），二〇〇一年第五期，頁一一七。

註⑦ 「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在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外語科中逐步增加聽力考查的通知（二〇〇〇年一月二十五日）」，*教育部政報*（北京），二〇〇〇年第三號，頁一一九～一二〇；張堯學，「加強實用性英語教學提高大學生英語綜合能力」，*中國高等教育*（北京），二〇〇二年第八期，頁五。

註⑧ 何琍，「WTO 對大學英語教學的挑戰」，前引文；金豔，「完善考試評估體系促進實用英語教學」，*中國高等教育*，二〇〇二年第十一期，頁一五。

註⑨ 龐紅梅，「中國英語教育發展趨勢」，*清華大學教育研究*（北京），二〇〇一年第三期，頁一四八～一五〇。

註⑩ 「教育部關於在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中增加外語（非外語專業）聽說能力測試的通知（二〇〇一年六月十八日）」，*教育部政報*，二〇〇一年第十號，頁四七一～四七六。

試代之^⑩。此一政策對於「全民英檢」的發展，和英文教育的推廣，無疑地具有積極的效應。

然而，其餘的議題多只是在規劃當中，而且均面臨著各種挑戰。如前所提，教師不願下鄉受聘使城鄉英語教育資源失去平衡，至今仍得仰賴外籍教師的愛心解決。對於小學學生英語能力差距懸殊造成教學困難，雖有學者建議分級教學，卻因涉及教育公平的敏感議題，以致教育部長黃榮村有「能力分班是社會的禁忌，教育部沒有立場實施」的結論^⑪。泛政治化的拼音體系採用議題，雖然在二〇〇二年八月行政院悄然通過採用通用拼音後定案，但是對於每日面對國際競爭中生存的產業界以及極需與世界接軌的學術界而言，卻是徒增困擾。

至於大學的英文教育，二〇〇一年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在任時期曾建議各大學對大一新生進行「安置測驗」，並研議將各大學培育英文系學生與提昇非英文系學生英文能力之規劃及執行納入評鑑^⑫，次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也強調將推動大專院校教學國際化，鼓勵英語授課、英文論文的撰寫。不過至今，比較具體的措施便是宣佈將實施博士候選人出國進修一年政策。至於大學本身，由於大學自主，大學一年級的英文課程，因校而異，端視各校或各系教師的共識^⑬，仍具改革的空間。另外，近日，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元智大學、世新大學等，紛紛以獎助金，鼓勵教師英文授課，引起熱烈的討論^⑭，但是成效如何，仍待觀察。

(二) 延攬海外人才

最近一年，在學者、企業和社會的不斷呼籲之下，台灣對於大陸海外留學生和科技人才來台工作採取了比較寬鬆的政策，於二〇〇二年一月中旬延長大陸科技人士留台年限，從三年改為六年，縮短大陸經貿與科技人士申請來台手續，八月又提供薪資與津貼補助大陸諾貝爾獎得主、國家級院士、年營業額10億美元以上的企業負責人或執行長，以及國家級大型計劃主持人來台，並延長其留台期限至三年^⑮。同年六月，

註^⑩ 如內政部警政署外事部警官的任用和升遷、公費留學英語能力認定、院公證人均以之為根據。台灣大學要求民國九十一年度入學新生畢業時需通過中、高級檢定。國泰人壽、士林某電機公司以之為考核人員升遷或薪資獎勵之依據。請參閱：<http://www.gept.org.tw/indexie.asp>。

註^⑪ 「國小英語教學能力分班，教部公共論壇決策參考」，中央日報，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第九版。

註^⑫ 高教簡訊，第一二二期，民國九十年五月十日，頁六；高教簡訊，第一二三期，民國九十年六月十日，頁一二。

註^⑬ 例如在整體政策方面，元智大學採取分級教學，台灣大學決定對新學年度新生採取英文水平的要求。政治大學雖然將大一英文分成兩級，但必修只有一年，並未要求初級者在通過後晉級。陽明醫學院對七年的醫科學生6個學分，四年制學生4學分。請參閱「搶救英語能力大學備戰」，台灣立報，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五日，wisenews；葉俊士，大陸高校英語教育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一年七月，頁一二五。

註^⑭ 見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第十三版。

註^⑮ 「大陸專才來台三年延至六年」，中央日報，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十九日；http://media.career.com.tw/epaper/enevs/center_news?no3=9034。

國防役名額也開放，給予年滿 18 歲以前至海外求學並在國外獲得碩、博士的科技人才申請^⑩。但不容否認的，本土化的認同、經濟的衰退也將許多本土科技菁英，甚至仍滯留在海外的菁英推向彼岸。

大陸則是加速推動「引進外智工程」，向現今仍滯留海外 25 多萬的大陸留學生招手。二〇〇〇年，上海市以「柔性人才流動」的口號，向大陸各省和海外人才招手，並提出「太平洋西岸的國際中心城市」的願景，宣稱要在二〇〇五年建成亞洲人才資源和全國人才集聚中心^⑪。

除了加強英文教育和延攬海外人才外，值得注意的是大陸積極推廣漢語教育，並以之為招攬國際留學生赴大陸求學的主要動力。

自大陸向世界打開大門之後，外籍學生的漢語學習便由台灣快速轉移至大陸，而台灣的決策者或學術菁英陷入在本土化和去中國化的爭辯之中，未能即時掌握住漢語教育的發展，亦任令資源流失。一九八〇年，大陸招收的留學生僅 1381 人，一九九〇年代，漢語學習的熱潮隨著中國熱不斷上升^⑫，大陸的外籍留學生人數也快速成長，二〇〇〇年達 5 萬多人（見表二）。

表二 大陸外籍留學生人數 (1992 年~2000 年)

年代	總人數
1992	14,000
1993	18,000
1994	22,000
1995	32,758
1996	41,211
1997	39,035
1998	43,084
1999	44,711
2000	52,150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年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至二〇〇一年。

大陸亦抓住機會，積極發展漢語教學，一九九八年針對海外華人和華僑子女編寫新教材，成立對外漢語教學博士學位、對外漢語教師培訓班。一九九〇年初開始在海外舉行的漢語水平考試（HSK），亦不斷擴張，至二〇〇〇年，考試地點增加到 47

註^⑩ 「小留生開放國防役甄選」，中央日報，二〇〇二年六月八日。

註^⑪ 龐國明，「人才市場如何直面 WTO」，中國人才(北京)，二〇〇二年第二期，頁九。

註^⑫ 除日本、韓國，一九九七年美國教育部將中文列為高中畢業會考外語之一，二〇〇二年美國有 300 多所大學開設中文課程。同樣的巴黎近幾年中文班也增加 10 多家，見李海績，「抓住『入世』良機提昇對外漢語教學的國際地位」。中國高等教育，二〇〇二年第六期，頁二六~二八。

個，遍佈 21 個國家和地區^⑩。近年，大陸學者從促進國際交流、利用外國智力（如英語教學）、提升大學經濟效益（國際留學生消費）等角度，以及占領國外漢語教學市場的願景，為漢語教學的擴張定位，推動籌劃建立國家級的對外漢語網絡教育中心，並完善日漸普行的漢語水平考試^⑪。

七、結 語

本文指出，二十世紀末，由於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潮流，以及知識的普及和專業知識的普及化，各國推動英語教育時，不僅只是提升人民的基礎英文能力，更強調培育具有國際視野的英語專業人才。對於近年面對大陸人力資源快速發展挑戰的台灣，此一定位尤其重要。有鑑於此，本文從兩岸人力資源發展的背景、英文教育的發展、民間語文學習資源和人才儲備，以及「入世」後的人力資源策略等四個方面，比較分析兩岸近年的英語人力資源發展。

從本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台灣擁有近三十年英文教育發展的基礎，兼之豐厚的社會資源和科技資訊，但是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在一連串政爭與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辯的環境之中，台灣人力資源發展策略一直未得定位，台灣英語專業人力資源發展的優勢漸失，並且正面對著來自彼岸嚴厲的挑戰。

就整體的人才發展策略而言，在台灣，自從經濟、人力規劃政策、教育三合一的發展政策受到強烈抨擊之後，不但人才發展的議題受到拖累飽受壓抑，教育發展也與人才發展分道揚鑣。一九九〇年代初，國民黨政府曾提出發展亞太營運中心和培育國際型人才的願景，卻因兩岸關係的重新定位，陷入國際化與本土化的意識形態爭論的泥沼當中，難以落實。當此之際，學界卻又將精力投注於招生人數的擴張和校園民主化，對於學術研究的提昇、課程的調整與改革等攸關國際化的發展，未能提出前瞻性的規劃，即時支援受挫的人才政策。

相對的，大陸從昔日的反美、鎖國的時代，進入改革開放的紀元，勞動力市場的機制也在國家強勢的引導下逐漸建立；人力資源發展政策亦從意識形態掛帥轉入專業專才的發展，以致學術科技的推動和國家競爭力也相對提升。一九九〇年代，中共積極參與國際舞台，更加速經濟和人事制度的改革，並推動大陸與國際潮流接軌，以菁英發展為取向，推動國際型人才。與之同時，高等教育的發展質量並進，一方高速擴張，另方面藉「211 工程」政策的推出，鼓勵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菁英大學，加速學術機制的建立，加強與國際學術的接觸。

就英文教育本身而言，大陸於一九八〇年代重新出發後，便以各級重點學校為主

註⑩ 以上請參閱中國教育年鑑·1999（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十二月，頁三九一～三九二；中國教育年鑑·2001，頁二八二，二八八～二八九。

註⑪ 如李海績，前引文；李大遂，「惟精唯一、志在高遠—為我國對外漢語教學事業發展獻計」。北京大學學報，第三十九卷第四期，二〇〇二年，頁一一九～一二五；李海燕，「入盟 WTO 對我國教育的影響」，教育發展研究，二〇〇二年第七/八期，頁二八～三〇。

快速發展，並以大學階段為重心。英文教學大綱和教材幾經修正，大學英語能力檢定考試亦獲得社會的公信。台灣的英文教育發展重心於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轉向小學階段的發展，卻受困於通用與漢語拼音的意識形態之爭，及其與國語、鄉土語教學之間定位問題，發展速度甚慢。至於大學階段，因大學自主，掌握不易，但整體而言，大一英文時數縮減、研究所英文教學形式化，英文教育發展不進反退，又受到就業市場重技術輕英語語文能力的趨勢，以致大學生英語能力不進反退步，大學所培育的人才，如誠陞科技董事長盧燕暉所形容的，至多也只是「區域性人才」^⑭。

最後，在人力資源儲備上，台灣面對著海外留學生人數逐年減少、科技精英流向彼岸的挑戰。大陸卻擁有外資企業和跨國公司任職的優秀人才，並以各種積極的政策吸引數十萬的海外留學生返回大陸。

「入世」之後，大陸從國際人才培育和英、美雙語專業人才培育的角度規劃，台灣將焦點放在基礎英文的發展，如今還在去中國化和本土化的爭議中打轉。大陸各級學校紛紛推動英語分級教學，台灣的中、小學階段的英文教育，還在公平與效益之間找尋平衡點，寸步難移，而大學階段的英文教育改革，則因大學、系所自主和各校菁英的主觀思維而各異。在吸引海外人才，大陸以積極措施吸引滯留海外的人才。相對的，台灣一方面面對國際型人才枯竭的警訊，另一方面對於人才的開發，似乎回到意識形態和防堵的途徑。最後，當大陸學、官積極規劃、推廣漢語教學，為各校經濟效益的提升開路，並促進大陸與國際的互動時，台灣卻是任令原已擁有的漢語教學資源流失。

自一九八〇年代，大陸學者常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語，引介他國之長。儘管大陸整體的英語教育發展，存在嚴重的城鄉差距、師資不足、填鴨式的教學、應試導向等諸多缺陷，但是大陸對於中、英雙語人才培育的重視、對於英語語文能力鑑定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對於搶占漢語市場的強烈企圖心，以及對吸引海外留學生資源的積極，均值得台灣重視和學習。近年，台灣一些企業亦開始關注員工的英文能力的強化^⑮，但是就整體發展政策而言，仍待聚焦。筆者僅就本文之所析，對於台灣英語專業人才之培育提出以下建言：

首先，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台灣應學瑞士等小型國家，一方面提升國民英語整體素質，一方面要提升專業人力的素質和國際視野。因此，台灣的英語教育不應停留在基礎英文的普及，應以過去半世紀的發展和社會資源為基礎，為初、中、高三級的英語教育的推展做一完整、宏觀的規劃。

其次，在教學方面，正視學生英語能力的差異問題，從教育機會公平而非教育產出公平為出發點，破除僵化、齊一的班級教學，結合社會豐富的民間資源，自小學階段起推動英文分級教學。更重要的是積極推動大學普通英文課程改革，鼓勵各大學設

註^⑭ 李雪莉，「台灣能培養出國際人才？大學戰全球開打」，*天下雜誌*，第二四九期，民國九十一年二月，頁一七八～一八四。

註^⑮ 「職場英語能力需求大調查」，二〇〇二年九月三日，<http://media.career.com.tw/epaper>。

置高級英語課程，並提高研究所入學考試英文科目成績，以解決多年來大學英語教育後繼乏力的問題，並為專業人才英語能力的提昇奠定紮實的基礎。前述香港以退費方式鼓勵大學畢業生參加英語水平評核顯然比大陸大學統一鑑定考試具有彈性，值得台灣參考。

第三，加速完成普及英語的基礎設施，如強化全民英檢之功能與公信力，以為大學甚至中學英語分級教學之參考，及鼓勵終身學習者自我提升。更重要的是擺脫中文譯音拼音系統之爭議，畢竟通用拼音只是「語音符碼」，不是語言，更非文化，其主要功能在於輔助對外華語教學、其他譯音^⑭，換言之，「標示英語化」僅屬於國際化基礎建設中的枝節末梢。台灣應學習英國教育機構藉美語的擴張大發利市的經驗，從國際視野和兩岸競爭的角度，找出定位，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將更多的精力和資源投入在提昇偏遠地區的英文教育、培育和提昇中英雙語專業人才，以至其他外國語文人才的素質。

最後，在推廣英語語文時，歐洲許多國家不約而同開始重視本國語文能力的保持和提昇。凡學語言者均知，第二語言能力的晉升是建立在深厚的母語基礎上。長久以來，國人偏重在英文教學的改進和英語能力的強化，卻忽略了自己語文的教育和能力的強化。近日，中研院院士批評國人中文程度太差，呼籲加考作文，我教育部應藉此機會同步推動國語語文教學的改革與提升，如此雙管齊下，必可為台灣培育中、英文雙語人才的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

*

*

*

註^⑭ 陳世圻，「中譯拼音改變對國際接軌的影響」，中央日報，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三版。

Globalization and Bilingual Manpower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Jueichi Wang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anks to globalization, promoti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has become a hot issue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is paper, from the angle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has mad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cies, learning resources, and the reservoir of bilingual (English-Chinese) manpower on both Taiwan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over the past five decad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although Taiwan is still superior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terms of promoti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over the past decade it has ostensibly been losing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due to lack of efficienc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power policy, particularly in the cultivation of bilingual skilled manpower. To keep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Taiwan, in addition to continuing to promot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should all the more stres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at home.

Keywords: globalizatio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bilingual specialized manpower

參考書目

- CCHEERS 編 (2002), **搶不走的優勢：兩岸人才大車拼**, 台北：天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中國教育年鑑·1999**, 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
- 中國教育年鑑·2001**, 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
- 王昭蓉 (2000), 「台灣地區民衆失業率與高教低就之研究」, 國立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瑞琦 (1994), **中國大陸大學聯招與高教之發展**, 台北：文笙書局。
- 王震武、林文瑛 (1996), **教育改的台灣經驗—國民教育的政策及行政措施分析**, 台北：業強出版社。
- 台灣研究基金會 (1994), **台灣的教育改革**, 台北：前衛出版社。
-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1996), **教育改革總諮議總報告書**, 台北：教育部。
- 李明軒、邱如美譯 (1997), 波特著, **國家競爭優勢 (上)**, 台北：天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施玉惠等 (1998), **國民小學實施英語教學之可行性探討**, 台北：教育部編印。
- 高長 (1982), **中國大陸人才資源分配問題之研究—從制度面分析**, 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 許擇昌 (2001), **從留學生到美籍華人：以二十世紀中葉臺灣留美學生為例**, 台北：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 陳春蓮 (2000), 小學外語教學之研究, 國立台灣師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陸杰華 (1999), **人力資源開發與緩解貧困**, 北京：新華書店。
- 賀德芬編著 (1991), **大學之再生—學術自由·校園民主**,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 葉俊士 (2002), 大陸高校英語教育之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 廖元和 (2000), 中國西部工業化進程研究, 重慶：重慶出版社。
-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系 (編) (2001), **第十八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文鶴出版社。
- 鎮天錫、全煥模、張丕顯 (1983), **人力政策的形成與實施**,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期刊論文

- 「人才戰略細化政策思路」 (2002), **瞭望新聞**, 25(6月17日), 頁26-28。
- 毛連塢、湯梅英 (1992), 「兒童學習英語之時機成效及相關研究」,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 23, 23-36。
- 王行 (1983), 「人才胡不歸?」, **天下雜誌**, 25, 155-156。
- 王瑞琦 (1988), 「論『文革』後大陸人才資源配置」, **中國大陸研究**, 41(6), 81-100。

- 王瑞琦 (2000), 「九〇年代大陸高等教育發展之研析」, **中國大陸研究**, 43 (4), 59-80。
- 王維貞 (2001), 「從各國科學與工程博士培育看高階科技人才流動」, **科技發展政策報導** (台北), 09, 695-703。
- 王麗雲 (2002), 「中文拼音政策的爭議與課程政治面向的反省」, **教育研究集刊**, 48 (1), 98-131。
- 王麗雲 (1999), 「台灣高等教育擴張中國家角色分析」, **國立中正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分冊), 10(1)。
- 田珂 (2000), 「關於大學英語教學幾個問題的探討」, **遼寧教育學院學報**, 17 (6), 71-73。
- 石素錦 (1958), 「從國小英語教學談師院師資培育與因應之道」, **教育資料與研究**, 24 期, 11-14。
- 何琍 (2001), 「WTO 對大學英語教學的挑戰」, **學術探索** (北京), 5, 205-208。
- 吳俊憲 (2001), 「小學實施英語教育的困境與突破」, **國教世紀** (新竹), 195, 24-28。
- 李大遂 (2002), 「惟精唯一、志在高遠—為我國對外漢語教學事業發展獻計」, **北京大學學報**, 39 (4), 119-125
- 李秀芬 (2002), 「學科內容本位之英語教學課程」, **教育研究月刊**, 8, 129-143。
- 李其榮 (1997), 「對中國『腦流失』的有益探索—評中國腦流失在美國—90 年代中國學生、學者的觀點」,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 4 期, 58-60。
- 李俊明、臧聲遠 (2002), 「搶救台灣學生英語程度：兩岸英語能力比一比」, **Caer 就業情報**, 312 期。
- 李炯英 (2002), 「中國現行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問題與思考-兼評國內外相關研究」, **外語教學**, 23(5), 33-38。
- 李振清 (2001), 「英語教育三十年」, **海外學人**, 4, 24-31。
- 李海燕 (2002), 「入盟 WTO 對我國教育的影響」, **教育發展研究** (上海), 7/8, 28-30。
- 李海績 (2002), 「抓住『入世』良機提昇對外漢語教學的國際地位」, **中國高等教育**, 6, 26-28。
- 李雪莉 (2002), 「台灣能培養出國際人才？大學戰全球開打」, **天下雜誌**, 249 (2 月), 178-184。
- 沈添鈺 (2001), 「台灣中區各縣市國小英語教學現況與問題」,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系 (編), **第十八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558-561。
- 汪寶榮 (2000), 「論困擾中學英語教育的四大誤區」, **紹興文理學院學報**, 20 (1), 105-108。
- 周大平 (1999), 「新一代留學生回國圖甚麼」, **瞭望新聞**, 14 期, 4 月 15 日, 46。
- 周先俐 (1992), 「大一英文教學之檢討」、「英文組結論報告」, **大學院校共同科人文課程教學改進研討會論文集**, 11 月 28、29 日, 65-81。

- 林本炫(1998),「當前學費政策的背景分析」,《國策專刊》,5,4-6。
- 林安樂(2000),「台灣傳統產業的困境與脫困」,《經濟前瞻》,3月5日,701-74。
- 林婉蓉、徐嘉卉(2002),「兩岸人才直接過招」,《遠見》,2月,100-105。
- 林靜宜(2001),「台灣科技人才爭鋒矜谷」,《遠見》,5月1日,154-163。
- 金豔(2002),「完善考試評估體系促進實用英語教學」,《中國高等教育》,11,15。
- 非公有制企業人才調查課題組(2002),「非公有制企業人才調查狀況」,《中國人力》,7,4-7。
- 黃津孚(2000),「WTO與人才戰略」,《經濟管理(北京)》,5期,6-11。
- 段嘉芊、周廣榮(2002),「《大學英語》與四、六考試的相關分析」,《雲南民族學院學報》,2,115-118。
- 胡德映(1999),「中國英語教育九十七年回顧」,《山東外語教學》,4,55-57,74。
- 徐春霞、高平(2001),「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斷想」,《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34-136。
- 高旭陽(2001),「大學英語分級教學改革的探索與思考」,《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98-100。
- 高博銓(2002),「全球化與教育改革」,《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12(6),頁6-20。
- 張丕繼(1994),「人力發展展望」,《研考雙月刊》,19(6),13-21。
- 張堯學(2002),「加強實用性英語教學提高大學生英語綜合能力」,《中國高等教育(北京)》,8,5。
- 張湘君(民90),「89學年度台灣北區各縣市國小實施英語教育教學情況報告」,銘傳大學應用英語系(編),《第十八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553-557。
- 教改會秘書組(1994),「『鬆綁』原則研究計畫案」,《教改通訊》,3(12月)。
- 教育資料文摘(1999),四月號,122-124。
- 陳荷榮(1999),「培養跨世紀的英語教育人才」,《孝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3),81-84。
- 曾月紅,「台灣東區各縣市國小英語教學實施現況與問題探討」,銘傳大學應用英語系(編),《第十八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565-569。
- 湯華(2000),「構築新世紀我國人才制高點」,《瞭望新聞》,1月7日,3-5。
- 焦紅艷(2002),「中國培訓市場十大現狀」,《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複印報刊資料)》,7,6-7。
- 楊艾俐(1983),「掀起人才回流浪潮」,《天下雜誌》,第25期,157-160。
- 榮芳、趙勁松(2000),「我國人力資本外流的成因分析及對策建議」,《科學與科學技術管理(天津)》,21(12),10-14。
- 趙必孝(1996),「我國因應亞太營運中心的人力資源規劃」,《勞資關係月刊》,15(8),464-473。
- 劉任(2002),「150大在台外資企業」,《貿易雜誌(台北)》,106(8月16日),8。

- 戴維揚 (2002) , 「國小英語課程的沿革與展望」, **中等教育**, 53 (2) , 32-51。
- 謝邦秀 (2001) , 「中國大學英語教學大綱介評」, **北方論叢** (黑龍江), 5, 117。
- 簡建忠 (1996) , 「人力資源發展對亞太營運中心之影響」, **勞資關係月刊**, 15(8) , 454-463。
- 藍科正、林嘉慧、吳惠林 (民 83) , 「台灣的高級人力資源預測」, **教育研究資訊**, 3(5) , 1-16。
- 藍麗娟 (2002) , 「兩岸人才競爭力比較」, **CHEERS** (編) , **搶不走的優勢：兩岸人才大車拼**, 台北：天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龐紅梅 (2001) , 「中國英語教育發展趨勢」,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 (北京), 3, 148-150。
- 龐國明 (2002) , 「人才市場如何直面 WTO」, **中國人才** (北京), 2, 9。
- 蘇復興 (1995) , 「評國、高中開設第二課程」, **國立編譯館通訊**, 八 (1) , 43-45。
- 蘇復興 (2001) 「台灣南區各縣市區國小英語教學實施現況與問題探討」,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系** (編) , **第十八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562-564。
- 關躍明、陸琳 (2000) , 「大學英語四、六級統考的正負效應」, **雲南師範大學學報**, 148-150。
- 龔修煥 (2001) , 「大學英語過級考試引起的思考」, **黔西南民族師專學報**, 2, 61-68。
- 高教簡訊 a** , 122 期 (民國 90 年 5 月 10 日) , 6。
- 高教簡訊 b** , 123 期 (民國 90 年 6 月 10 日) , 12。

報 紙

- 施鈺文 (2002) , 「台灣高階經理人爲大陸企業打拼」, **中國時報**, 8 月 13 日, 11。
- 袁夢德 (1999) , 「趕進浦江? 登上人才高地」, **中國青年報** (北京), 7 月 1 日, B3。
- 陳世圻 (2002) 「中譯拼音改變對國際接軌的影響」, **中央日報**, 7 月 26 日, 3。
- 陳曼玲 (1999) , 「小英師資筆試考題難度可比托福」, **中央日報**, 3 月 22 日。
- 劉方永 (2001) , 「國際教育機構『開疆拓土』」, **中國青年報**, 12 月 7 日, 5 版。
- 謝凌惠 (2002) , 「英語國際掛帥, 補教相輔相成」, **中央日報**, 3 月 22 日, 13。
- 「一項專業考試顯示中小學英語師資水平較低」 (2002) , **中國青年報** (北京) , 6 月 13 日, 5。
- 「一項專業考試顯示中小學英語師資水平較低」 (2002) , **中國青年報**, 6 月 13 日, 5。
- 「大陸專才來台 3 年延至 6 年」 (2002) , **中央日報**, 1 月 19 日, http://media.career.com.tw/epaper/eneews/center_news?no3=9034。
- 「大學修英語提升競爭力」 (1999) , **民生報**, 1 月 8 日。引自**教育資料文摘**, 88 年 3 月號, 133-145。
- 「小留生開放國防役甄選」 (2002) , **中央日報**, 6 月 8 日。

- 「北市教師甄選明年起參酌英語能力」(2002), **中央日報**, 8月24日, 9版。
- 「考級低齡化是喜是憂?」(2002), **新快報**, 6月18日, <http://www.wisers.com>.
- 「吳大猷:過度本土化如關門做皇帝」(1998), **中國時報**, 7月7日, 11版。
- 「李遠哲:無法立足台灣,如何國際化」(1998), **中國時報**, 7月7日, 11版。
- 「南開雙語教學蒞港澳取經」(2002), **文匯報**(香港), 3月5日。<http://www.wisers.com>.
- 「英語師資下鄉,教部有請外籍兵團」(2002), **中央日報**, 7月13日, 9。
- 「英語培訓市場『蛋糕』誰能分享」(2002), **經濟日報**(北京), 3月29日。<http://www.wisers.com>.
- 「英語當道母語閃邊」(2002), **中國時報**, 5月31日, 19版。
- 「國小英語教學能力分班,教部公共論壇決策參考」(2002), **中央日報**, 7月13日, 9版。
- 「國小英語教學問題多多」(2002), **中國時報**, 5月30日, 17版。
- 「培育國際通用人才-中學教育國際多元化透視」(2002), **福建日報**, 4月4日 <http://www.wisers.com>.
- 「教局:鄉土語言教學沒少」(2002), **中國時報**, 5月31日, 19版。
- 「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在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外語科中逐步增加聽力考查的通知(2000年1月25日)」, **教育部政報**(北京), 3, 119-120。
- 「搶救英語能力大學備戰」(2002), **台灣立報**, 3月25日, <http://www.wisers.com>.
- 「搶救英語能力大學備戰」, **台灣立報**(2002), 3月25日, <http://www.wisers.com>.
- 「群雄爭奪百億英語教育蛋糕」(2002), **文匯報**(香港), 4月22日, <http://www.wisers.com>.
- 「滬寧杭爭奪優秀學子」(1999), **中國青年報**, 12月24日, 5版。
- 「職場英語能力需求大調查」(2002/9/3), <http://media.career.com.tw/epaper>.
- 光明日報**, 2002/6/13, <http://www.wisers.com>.
- <http://www.ugc.edu.hk/chinese/documents/press/pr011102c.html>.
- <http://www.cepd.gov.tw/service/board/coun-dev/國發計畫0617核定版.pdf>
- <http://www.gept.org.tw/indexie.asp>

英文書目

- “In Europe, Some Fear National Languages Are Endangered,”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2001, A.1.
- Blundell, Richard et al. (1999),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he Returns from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the Individual, the Firm and the Economy,” *Fiscal Studies*, 20, no.1, March, 1-23.
- Cao Xiaonan (1996), “Debating 'Brain Drai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Compare*,

26, no. 3, pp. 267-285.

- Crystal, David (1997),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enport, Salley.& Bibby, David (1999), "Rethinking a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Small Country as 'SME,'"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vol. 11, no. 3, 431-462.
- Freeman, Rebecca D.(1998),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Goldsten, Brian L. and Stephen J. Anderson(2002), "Foreign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WTO Capacity Building,"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January-February, 8-15.
- Hill, Charles W. L (2001), *Global Business Today*, New York: McGraw-Hill.
- Kachru, Braj.(1982), *The Other Tongue :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Oxford: New York : Pergamon Press.
- Kemper, Cynthia L (1999), "Scare Bleu! English as a Global Lingua Franca?" *Communication World*, vol. 16, no. 6.
- Kerr, Clark(1994).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Issu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 Kinoshita, J. (1993), "Counting on Science to Compete," *Science*, 262(5132), 348-350.
- Larmer, Brook.(2000), "Home at Last," *Newsweek*, July 31, 11-14.
- Macleod, Alexander.(1996), "The World Rushes to Speak and Write 'American' English,"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4, 1996, 10.
- Mathur, Vijay K.(1999), "Human Capital-based Strategy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13, no. 3, August, 203-216.
- Papapavlou, Andreas N.(2001), "Linguistic Imperialism? The Status of English in Cyprus," *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25:2. 167-176.
- Rust, Val D.(1999), "Toward Taiwanese Educational Polic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digenization," *教育科學的國際與本土化*, 29-53, 台北市：揚智。
- Schultz, Theodore W.(1980), *Restoring Economic Equilibrium: Human Capital in the Modernizing Econom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Seaton, I.(1997), "Comment: Linguistic non-imperialism," *ELT Journal*, vol. 51, no. 4, 381; Barbara Wallraff.
- Seaton, I.(2000), "What Global Language?" *The Atlantic Monthly*, November 2000, 52-61.
- Taylor, Sandra et al., *Educational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New York, 1997.